

天下第一田

——麻城建国一社早稻亩产36,956斤

中共麻城縣委員會編
湖北人民出版社



2 018 8682 4

天下第一田
——麻城建国一社早稻亩产36,956斤
中共麻城县委员会编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武汉解放大道332号)
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新印字第1号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汉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frac{1}{32}$ 开 · $\frac{5}{8}$ 印张 · 15,000字

1958年8月第 1 版

1958年9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0

统一书号: I16106 · 116

目 录

乘东风破三万斤关

——記麻城建國一社如何創造高產的中共麻城縣委辦公室 1

再論“衛星”的重量

——祝賀麻城建國一社 1,018 亩早稻亩產 36,956 斤的偉 大勝
利龔同文 8

高產紅旗

——麻城建國一社創早稻高產 36,956 斤的經過湖 泊 11

在“衛星”周圍的人

——建國一社亩產早稻三萬多斤奇迹中的片斷李漢清 17



2 018 8682 4

乘东风破三万斤关

——記麻城建國一社如何創造高產的

中共麻城县委办公室

1958年8月9号，建国第一农业社的1.016亩早稻丰产田收割完毕。经过省、专、县三级丰产验收团和各乡、社数百名代表的反复丈量面积和收割打场验收，共收干谷37 547.12斤，创造了早稻亩产36 956.7斤的新记录。

在总路线下光辉照耀下

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县委6月中旬在閔集乡召开水稻现场会。会上学习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研究如何鼓足干劲来争取水稻大面积平衡丰产和创造高额丰产新记录。这个社的主任王乾成参加了这次会议。党所号召的要树立敢想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小麦亩产5 000斤、6 000斤、7 000多斤的卫星，象磁石吸铁一样地吸引着王乾成的思想。县委又向到会的人提出，能不能把稻谷搞成一年三季收？把原有的试验田提高一步，搞亩产3万斤的高产？并且提出了办法：把已经定植的早稻拔秧并丘，达到高度密植。腾出的田，可以插一季晚稻，一季晚稻比二季稻产量又会高些。王乾成原来搞早稻试验田只计划亩产6 000斤，连突破万斤关也没敢想过，县委这一下子提出要搞3万斤的高产，他感到很惭愧。1957年冬天他光荣参加赴朝慰问团的情景，在脑海里

又重現出来了：他曾經到過英雄的上甘嶺陣地，到過英雄黃繼光犧牲的地方去悼念。聽到介紹上甘嶺戰役志願軍的英勇事迹，當時自己感動得流淚了，決心回國後要以志願軍守衛上甘嶺的精神來打生產仗。回國後，周總理和省委負責同志都一再囑咐，在1958年大躍進中要大干一場。可是時間已經過去幾個月了，自己還沒有為人民做出什麼貢獻，而且還不敢大膽想大膽地干，這怎麼對得起黨呢？這和鼓足干勁、力爭上游是多麼不相稱啊！同時，他也感到很興奮，喜的是黨的總路線、小麥衛星和搞3萬斤高產解放了自己的思想。他心里突然亮了，渾身是勁，心想：我為什麼不能想的更高一些，搞4萬斤、5萬斤的呢？他帶着一股子勁回到了社里。

冲破保守思想的障碍

當王乾成在支部大會和社委會上，提出除了要大搞平衡半產以外，還要搞早稻畝產3、4萬斤的高產以後，引起了一場激烈的爭辯。37個管理委員和生產隊長當中，副主任馮福炳、社委王茂剛、第二生產隊隊長羅學江等20多人，積極贊成搞；可是反對的也大有人在。社委榮德宗振振有詞地不同意搞高產，說：“搞大面积平衡增產不是一樣增產，搞典型高產有啥意思？”還有的人說：“早稻已經插下去一個多月了，生米快煮成熟飯了，怎麼還要重新搞高產。”“口一張几萬斤，一畝田有多大呀！”歸根結底，他們不相信能辦得成功。

堅決主張辦的人沒有被這些保守論調吓倒，他們按照撥秧的道理，揣摸實現高產的具体措施，越想越感到有把握。他們想河南7000多斤的高產小麥土地還有很大空隙，水稻只要在這個基礎上翻5翻就是畝產3萬多斤。原來的試驗田是1×4寸、1×5寸，1畝可以產5000斤，搞撥秧不講什麼几几寸，盡田

插滿，8畝合在一起，不是就有4萬斤了嗎？他們就拿這些根據和保守的人算賬辯論，絕大多數人都同意了辦這個高產。於是他們就計劃在河北墳1016畝的油沙田里搞，把周圍8畝田的秧拔在這丘試驗田里。並決定由王乾成、馮福炳、王茂剛、羅學江等人負責。

发动群众办高产

要在河北墳拔秧搞早稻高產的事傳開以後，群眾中議論可多啦！有些人說：“畝產4萬斤，把二、三十畝田的谷打在稻場里差不多。”特別是聽說要把8畝田的秧再并在一畝田里，有些群眾更埋怨本墳的干部說：“好事沒見你們搞來，吃亏事總是你們搞來了，真是睜着眼跳崖。”他們耽心拔密了，倒伏爛後要賠產。社委王茂剛是別墳調來的，有些壞人就乘機在群眾中挑撥，說他不顧社員，失敗了他回本墳，賠產是河北墳的社員受損失。特別是有些老年農民，在拔秧時出工本不必走那塊田過，他們偏偏彎路也要彎到那塊田邊去說几句怪話。羅文高干脆打賭，說這樣辦要能收谷他願把頭剃下來給干部坐。在開始拔秧的那天上午，32個人下田，不一會就有5個人思想闊不通而“罷工”了。

群眾不積極支持，這是什麼原因呢？干部分析了一下，原來是沒有做好工作。他們馬上召開了青年人會，然後分頭去串連發動，討論辦高產，辯論辦高產，是光只干部要辦還是社員都需要，並把實現這個高產的根據講給群眾聽。群眾怕快打苞的秧拔了活不成，干部就先拔了一小塊做試驗。拔後沒有死，就拿這給群眾看。群眾曾作了一首表示懷疑增產的快板：“深耕一尺三，肥料要几千，心想搞增產，恐怕不如願——減產賠款。”社委會也作了快板鼓勵群眾：“深耕一尺三，肥料翻几翻，躍進高產，敢想要敢干，我們是個缺糧墳，不搞高產真難看，只

要决心干，高产有么难。缺粮变余粮，红榜考头名，电灯、电话还先架河北院。”群众知道了这些道理以后，认识到办高产是自己的事，都积极起来了。要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妇女社员刘德金并且表示决心“不办成高产不收兵”，少数说怪话的人也不敢公开说了。

新措施保証新指标

究竟要采取什么办法才能实现亩产4万斤的高产？试验的人在思想上是逐步明确的。虽然这块田获得高产的决定关键是实行了密植（高度密植），但是在没有并丘之前的培育也是十分重要的。他们在未决定搞4万斤高产以前，对这8亩田的培育还是很认真的，推行了一系列新的技术措施。因此，整个这块高产田的培育措施，可以分做两个阶段来分析：第一段就是从播种到第二次移栽前，也就是在原来的8亩田里培育秧苗，打下丰产的基础；第二段是从第二次移栽到收割，集中8亩田培育的成果，让它在1亩田里充分地表现出来。

在第一阶段里，基本措施是抓住育壮秧、深、肥、密。这块田的品种是本地江西早，是早稻中的晚熟种，种子经过了风选、筛选，两个半天的晒种和用水银剂密闭3小时，黄泥水选种、小苏打浸种一天一夜。3月26号浸种，4月1日播种，每亩稻田下种180斤。秧田里下了120担水粪和300担陈土的底肥，到秧现青时追水粪30担，秧到四、五寸时，每亩秧田又下了8斤化肥作送嫁肥。在四次寒潮来临时，冯福炳等都在田头烧温水参与到秧田里防冻，又用0.5%的“666”粉除虫两次，因此，秧苗很茁壮。

在深耕问题上，碰到了犁不深和耕牛不够的困难。社里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普遍套犁（即一次犁两层）；一是用锄头

深翻。全社1 100亩草子田，用鋤头挖了370亩，河北燒一天就挖断了19張鋤头，但是社員們說：“挖断了鋤头，斷不了我們深耕的决心。”試驗田都是深翻1尺4寸、1尺5寸。

这8亩田都是草子（綠肥）田，底肥每亩2 000斤草子施在最底层（兑30斤石灰），1 000担塘泥施在中层，200担陈土施在表层，其中最后用作本田的这1.016亩，草子多1 000斤，陈土多100担。秧苗第一次移栽前，每亩又下了15斤硫酸銨和6斤石膏的炒口肥。第一次插秧是4月27日，密度是1×4寸，每穴6—7根秧。插秧后7天薅第一次草，每亩又追肥水粪50担。这个期间正是大旱，但是这些田沒有断过一天水，从第一次插秧到第二次移栽（6月21日），这中间共有50多天，正是这个品种的发育盛期。执行上述措施，便为禾苗的发育創造了比較良好的条件。

在第二阶段8亩田的秧并在1亩田里，要保証不死苗不倒伏沤烂。为了过好这一关，采取了一套新的作法。第二次移栽是6月21日开始的，在沒有掇秧之前六、七天，每亩下了30斤硫酸銨的“欢送肥”，增强禾苗在移栽时的生长力。对于作本田的这1.016亩，不是在原1×4寸的基础上往下挤，而是把这块田的秧也扯起来，重新整田，重新插秧。下了180斤腐熟豆餅，70斤化肥，60担水粪，80斤过磷酸鈣和6担火灰的“欢送肥”。肥料施下以后，又把田翻了7寸深，耖一次，再进行掇秧。看来这种整田和施欢送肥，对于正在孕穗的禾苗，可以使它被移到新的地方以后，很快得到配合得到較好的、充足的养料，就不至于断气，并且能一直供应到成熟，好处是很大的。

掇秧时每蔸秧已分蘖到8—10根，禾高1尺多。怎样把8亩田的802 566蔸秧掇在一亩田里呢？經過試驗，一只手捏住禾苗下部，一只手順根往土里截断一部分根，把秧掇起来，做到

秧根上既不多带泥土，影响挤不下去，又不严重伤根，保住了秧在并丘以后一点也没有呈现萎縮的现象。社員們就是用这种方法，一蔸一蔸的把80万蔸秧栽在这块田里的。秧不好运，就用梯子平放着抬，用水桶挑，共用了400多个工，两天两夜才搬完。密度已經不能再講几几寸了，正如群众所說：“是插的‘挨挨寸’。”每一寸土地都是挤得满满的，那腾出的7亩田，接着就插上了一季晚梗。

突破最后一大关

人們最提心吊胆的就是搬秧以后的倒伏沤烂，有些人甚至完全沒有信心。但是王乾成等有决心战胜这一困难，他們从发动群众献計找到了办法。首先是在田边普遍每隔1尺多就插下竹桩，用繩子連成一个防倒网，网住禾苗。又每隔一天就用竹竿象翻芭蔓一样地把秧搬开一次，使田里通风。

很显然，上述办法对付不了狂风暴雨。搬秧以后，单单又遇上3次大风、两次暴雨。但是暴风雨吓不住搞高产的人們，每次起风下雨，負責这块田的干部就帶領社員一人一根竹竿子，站在田边扶着稻禾。7月22日是一次最大的暴风雨，从下午3点多鐘开始，100多社員站在田边擋风，大雨繼續到夜晚2点钟，个个被淋得象落湯雞，又沒有吃晚饭，夜晚又很冷，但社員們沒有一个中途退陣。社員罗学汉身体不好，被风吹倒了，社干部叫他先回去，他說就是死了也得把防倒搞好，爬起后又战斗。由于禾苗前期生长正常，禾秆粒壮，加上搬秧后的这些努力，終於保住了在谷粒未飽浆以前，沒有倒伏，基本上实现了高产的理想。谷子成熟以后，干部又帮助它一順风的倒在田里，穗子挨穗子足足鋪了有1尺多厚。据专家計算802 566 莖谷，共有7 681 000 句，每句平均有实粒84粒。

这个經驗能不能大面积推广？划不划算？这是許多人都考慮的問題。据計算，这块田产量比原 8 亩田高 8 倍，多投的劳力是拔秧 3 754 分，防倒通风 380 分，共 4 134 分。从劳动生产率来看，一般丰产田每亩需 100 个工，按亩产 500 斤計算，一个工生产谷 50 斤，这块田每个工生产 70 斤谷。由此可見，单就这一点看也是划算的；另一方面，早稻拔秧后腾出的田把原来的二季稻变为种一季晚梗，每亩一季晚梗可比二季多产 1 500 斤（按每亩 3 000 計算），并丘的 7 亩可多产谷 10 500 斤谷，这 1.016 亩田仍然可以收二季稻，这也說明只要改革了工具，劳力充足，品种安排好，这个經驗是有推广价值的。

这块高产田成功了，不仅为水稻高产开辟了道路，也带来了思想上的大丰收。在谷子成熟以后，社內組織了当初坚决反对的十几个老农到田里去參觀，他們一刁刁的数粒子，称赞象走进谷仓里一样。曾經打賭要剃头的罗文高，認識到自己的思想有些老朽了；罗学忠老头說：“我真是老破壞，今后要大改。”当各地代表前來賀喜的时候，罗学忠还自动参加打锣鼓，忘記了吃中饭，一直打到太阳落，人們再不說高产做不到了。林家寨的社員已經向河北垸的社員提出挑战說：“不怕你們早稻有高产，晚梗二季稻一定要压倒河北垸，50天后再見高低。”这个社干部和社員們都有信心运用这个經驗，鼓足比今年更大的干勁，在1959年爭取实现亩产万斤水稻社。

再論“衛星”的重量

——祝賀麻城建國一社 1.016 亩早稻亩产 36956 斤的偉大勝利
韓同文

1 亩田亩产早稻 36 000 多斤，这是难以想象的奇迹。这个奇迹的創造者，王乾成和他的战友們曾經坐在一起，想了一天，1 亩田能产多少斤早稻，2 万斤？能不能搞得 3 万斤？沒有把握。又想过搞它 5 万斤，怕不行，退到 4 万斤还怕不行，退到 3 万斤。要搞 3 万斤如何說服人？要找根据，找不到，翻破一切書包，也找不到亩产早稻 3 万斤的潜力。非要搞得亩产 3 万斤不可，根据何在？敢想敢說敢做这是根据嗎？那么敢想敢說敢做的根据又是什么呢？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克思列寧主义是活东西，因为掌握馬克思列寧主义的是活生生的人。亩产早稻 36 000 多斤里头有活生生的馬克思列寧主义，如果不信，到建國一社去看一看吧！

这个社第一沒有什么农业机械；第二沒有许多的化肥；第三也沒有什么农业科学家。然而这个社創造了亩产 36 000 多斤的奇迹靠什么！靠这个社的人。这些人，共产党员王乾成和他的 16 个战友以及許多社員，他們用自己的双手創造了这样的奇迹。这是因为他們按照党的領導——馬克思列寧主义的領導办事。这个奇迹的出現，是馬克思列寧主义的胜利。

話說過了。王乾成他們当时找根据，找来找去 找不着，他們下了决心，干吧！干出来就有根据。事在人为，人的潜力

是无限的，农作物赖以生长的空气、日光和水分，到处有，为什么农作物的产量各有大小不同，麻城建国一社的空气、日光和水分和别的地方比较起来并没有什么两样，王乾成和他的战友们也是人，为什么这个社出现了这样大的“卫星”。所有这些问题，让事实去回答吧！

这个社的亩产早稻36 000多斤的奇迹，给我们打开了挖掘农业生产潜力的大门。你瞧，你进门来瞧一瞧，这里面可深藏着哩！这个社1958年创造这个早稻丰产纪录，比1957年早稻平均亩产570斤增加了64倍多。设想一下，这个社的全部水稻平均产量将来有没有可能达到亩产3万多斤？这个可能性是客观存在，当然，更重要的是有赖于主观的努力。这个社已经提出这样的奋斗目标：争取1959年早稻最高亩产量达到4万斤到5万斤，全社水稻平均亩产量达到1万斤，比1958年增加5倍多。

“信不信由你”，这句话已经站不住脚了。信，或者不信，不是由你来决定的，而是由严格事实来决定。建国一社两个社员曾经为了不相信早稻可以亩产3万斤，发誓要剃头，要跳崖。现在，这个要剃头的社员正在兴高采烈地庆祝亩产早稻3万多斤而打起锣来了；那个要跳崖的人，也在庆祝的行列中放起铳来了。“剃头”的打锣，“跳崖”的放铳，这叫做情不自禁，或者说是服从真理，可见“信不信”不“由你”。有些人看了报纸也不相信这回事，来到建国一社的“现场”看一看，亲手摸一摸那厚敦敦沉甸甸的还没有割的稻子，吃了一惊，查一查，问一问，算一算，就相信了。事实胜于雄辩，就是这样。

建国一社的早稻丰产的事实证明，我在“卫星的重量”那篇短文里所說过的應該要求“卫星”飞得越高，重量越大。最高亩产量与大面积平均产量的关系应当是水涨船高。创造高产典型的目的是为了争取更大面积的平衡增产。水越涨船越高，高产典

型越高，大面积的平均产量越高，这样，高产典型才有意义。建国一社的亩产早稻3万多斤其所以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因为他推动了这个社的人创造了全社早稻亩产1700多斤的纪录，同时，更重要的是，鼓舞了这个社的人以更大的决心和信心，争取1959年全社水稻亩产1万斤。如果这个社的人，1958年只是集中力量搞高产典型，以至1958年全社早稻平均亩产还是500多斤，或者說，1959年全社早稻平均产量还是1000多斤，那么，这就是只見水漲，而船就擋了淺，岂不使人惋惜！

好得很，建国一社的同志不仅没有使我們惋惜，而且，使我們在祝贺这个伟大胜利的同时，看見这个社里的同志們正在高举着亩产早稻36956斤的大红旗，向着1959年全社亩产水稻万斤的方向前进。看来，建国一社就要放射一个飞得越高而重量越大的“卫星”。

高产红旗

——麻城建国一社創早稻高产36 956 斤的經過 湖 油

麻城建国一社亩产36 956 斤稻谷，是怎样来的呢？这里，讓我們把这一創造高产的来龙去脉簡要地描繪出来吧！

要不要高产？高产的意义在哪里？

1958年6月份，建国一社主任王乾成，从县委开高产會議回来，召开社主任會議商議办高产的事情。一听說要試驗亩产1万斤、2万斤、3万斤，很多人都呆了。第一次社主任會議，沒有結果。在第二次經營管委擴大會議上到了37人，王乾成又提起了办高产的事，他說，我們的社大，有18个垸子，千多戶，4 700 多人，男女勞力有2 000 多人，土質好，油沙土，水源也比較好。但是社委榮德宗却很圓滑的說：“办高产做么事，只要把大面积的稻谷搞好就行了。”几乎有一半人附和他的意見，其實里面很多人是怕困难的，根本不想办高产。社委林道黃是主張办的，他說：“我們社里有条件，办它一个二、三万斤的。”接着，很多人也同意他的意見，特別是青年人。

王乾成一心想創造早稻高产。他想，办高产有什么困难，还有上甘岭战役困难？上甘岭就能打胜仗，农业生产就不能打胜仗？1958年农历3月以前，王乾成代表麻城农民參加赴朝慰問團的時候，听战斗英雄們介紹，心情可激动啦！回县的时

候，中央和省里的负责同志都对他說：“农村正在搞大跃进，回去后好好干啦！”不久，小麦又接連发射出高产“卫星”，摘掉了历史上压在头上的低产帽子，出現了亩产5 000斤，6 000斤，7 000斤的高产紀錄，这都不是人干出来的嗎？

在管委扩大会上，王乾成领导大家辯論办高产的意义。他說：“大面积的生产肯定要搞好，但是办高产是給大面积树立旗帜，为了更好地搞好大面积平衡增产，叫大面积土地收更多的粮食。”辯論了一通，37个人中有27个人同意，6个人半通，有4个人（社委）仍不通。最后来了一个民主集中，把办高产在管委扩大会上通过了。

沒有根据怎么高产？从哪里去找根据？

搞試驗田树立旗帜，在辯論中是肯定了，可是能不能試驗亩产2万斤，3万斤，在大家的脑子里却还留下了一个問号。用什么办法才能达到高产指标呢？

过去有个經驗，訂生产规划，就得挖潛力、找窍門，社委們聚集一堂，在那里挖心思，議論紛紛。

全国劳动模范林世猛的棉花不是收千斤籽棉嗎？看看有什么經驗。

社里小麦规划亩产500斤，实收700斤，不是說明能高产嗎。

麻城县閻家河那里还有亩产28 000斤的紅苕哩！

窍門是这样找的，但是作物种类不同，1958年用不上，就是用得上，也不能解决亩产2万斤、3万斤稻谷的問題。

开了一天村委会，解决了其他方面的問題，但是还没有想出一个水稻高产的办法来，虽有一个人提出了要亩产2万斤，也只是口說了說，沒有切实根据。

在历史上找不出高产样本，想創造高产那就得要敢想，大

胆想。建国一社接着又开办高产的第三次会議，在这一次社委会上，他們从小麦高产里面得到了启发，在報紙上他們看到，凡是高产小麦，其中一条經驗就是密植。他們同时看到，高产小麦密植还不够，还能更密，收更多的小麦。入了这个門路，社委們在一块就算起水稻密植賬，如果插 2×5 寸，每亩6万蔸，每蔸9根，每穗75粒，就可以收到5 000斤。

“密些，再密些！”“假若不留空，把8亩田的秧接到1亩田里，我們来一个一指泥也不空，插‘挨挨’寸，8个5 000斤，不是要收4万斤嗎！”

苦思了两天的管委們，一听到这个門路，也都喜出望外。社委林道黃高兴地說：“不管怎样，按这样搞下去啊！”

选择什么地方办高产呢？管委会認為要有4个条件：（一）土質好，是油沙土；（二）劳力充足，办高产也不影响大面积的增产；（三）水源充足，旱一百天也沒有关系；（四）骨干强，青年人多。找到了河北垸的一块1.016亩。管委会并作了决定：这块田原高产3 000斤，試驗田产3万斤，社里評工分，达不到不赔产，增产得奖，如果劳力不足，青年突击队40人可以帮助。

当办高产的消息在群众中傳开时，一些有保守思想的人可就說开了。河北垸的社員罗文舉說：“我們垸里干部是一箇洋苕，好事不叫河北垸干，坏事就搞到河北垸来了！”何况办水稻高产，是处在农忙搞“四快”时，需要劳力、水源、肥料来支援。一提到这些問題，社員罗文月說：“不管减产不减产，工分哪个管？只要不赔产，有工分，叫我們怎干就怎干！”

社里向社員群众宣傳了管委会办高产試驗田的决定，同时又发动群众，算一算增产的好处賬，群众性的辯論就开始了。虽然有不少人在“觀潮”或是等待“算賬”，但是大多数的人認識到了高产的紅旗，带动大面积的增产，是为了多打粮食。如果

說，辦高產是費勞力，河北境1957年種的棉花多，要供應8萬斤糧食，光在5里路外挑糧食，就花了800個勞動日。人們說：“費勞力是为了增產，總比我們要供應，起五更、睡半夜，到境外挑糧划算。”大家都決心支援社里辦高產。

創造性的勞動，頑強的鬥爭

以社主任王乾成、生產副主任馮福炳、社委王茂剛、生產隊長羅學江為首的17人，就開始了高產試驗的操作，他們得到了社里青年突擊隊的支援，解除了勞力不足的困難，不影響社里其他生產的勞力。

“高產三萬要算難。深翻地是第一關”。過去有人挖地，但是誰見過有人耕地？王乾成他們搞高產，挖田，人犁田，人牛配合犁田都用了。挖田，把手挖起了一个个的血泡，也沒有誰埋怨。牛的力气有限，田犁不深，要深翻到1.5尺，王乾成他們就組成兩人一班拉犁，幫助犁田。社里牛不够，他們就不用牛，干脆用人拉。他們哪裏顧得上血泡和肩上的繩印，滿臉汗水更不消說了，他們只有一個心願，辦出高產樹紅旗，就這樣，把田整一道又一道，泥巴犁有1.5尺深。

“庄稼一枝花，全靠糞當家”，在這1.016畝高產試驗田里共施了底肥：陳牆土300擔，綠肥3000斤，塘泥1000擔，水糞30擔，石膏6斤，石灰30斤。此外撥秧開始前，把準備移栽的8畝秧，每畝施了15斤硫酸銨“歡送”肥，撥秧時，又施了“歡送”肥，計有豆餅180斤，硫酸銨70斤，過磷酸鈣80斤，水糞60擔，草木灰240斤。

正當要撥秧的時候，問題來了，貧農社員羅啟玉哭了。8畝田的秧都長得尺把高，撥到一塊田里死了，減了產怎麼辦呢？富農羅文學也哭了，他哭的是怕“累死人”，說什麼插 1×4 寸